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727

1929 年昆明北门街火药爆炸案的灾情分析

樊雨晨¹

(¹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1929 年 7 月 11 日下午, 在昆明城边北门街一带发生火药爆炸案, 爆发地居民死亡数百、受伤过万, 是昆明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是一起发生于云南地方军阀龙云部与胡若愚、张汝骥等部争夺较量的大背景之下, 是人为造成的、与政治因素相关联的惨案。在没有考虑民众生命安全、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下, 贸然搬运危险物品到人群聚集区域, 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由于此次爆炸案灾情奇重, 造成原因特殊, 牵涉面较广, 与以往发生的灾祸不同, 具有特殊的个案考察意义。

关键词: 灾难社会史; 火药爆炸; 灾情分析; 档案资料运用

一、引言

马颖生曾说过:“七·一一火药爆炸事件, 是昆明近代史上的一件大灾难, 但很少见诸报媒, 现在所知的人也不多了, 很值得回顾。”^[1]学界对于此次爆炸案的研究, 大多数用数百字介绍该事件的发生, 且侧重于从政治史和军阀斗争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于灾情的分析较少。本文则依托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档案资料、云南省图书馆馆藏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报刊、云南省地方志和昆明市地方志, 以及各类回忆录、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等, 采用个案分析法, 试图分析此次火药爆炸案的真实情况。

二、灾难发生的背景

1929 年 7 月 11 日午后 2 时 30 余分, 昆明市北门街一带发生重大灾害, 系火药爆炸引起人员、房屋等的巨大破坏, 给时人带来毁灭性打击, 损毁程度相当之深。究其爆发的原因, 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时云南省财政厅文件中仅仅提到“云南府昆明市近因军事关系政府搬运火药入城于七月十一号午后二时在北城内江南会馆忽然爆发天崩地坼, 烈焰浓烟充满空际, 须臾顽石破砖碎瓦, 黄尘杂裹尸肉骨血纷落如雨, 昆明城乡内外居民莫不奔号骇汗, 惨无人色, 附郭三四里住宅, 墙垣崩塌者无数, 东北城垣约三四里廛屋千余家, 立成瓦砾, 焚灰震裂死者千余人, 伤者近万人。”^[2]

1929 年龙云据守昆明, 为了怕胡若愚、张汝骥的军队“利用北门街外商山寺所藏火药炸药作为攻城之具”^[3], 下令军械局胡道文将北门外军火移入城内北门街江南会馆储存, 胡道文奉命派夫用牛车马车, 肩担赶运入城。由于夏季天气炎热, 加之来来往往火药沿途散落, 运输过程的疏忽, 最终导致了 7 月 11 日火药爆炸的巨大惨案。张希鲁在文中记录了火药爆发时的情形:“为防止敌方部队利用北门街商山寺所藏火药、炸药以为攻城之具, 乃派夫用牛车、马车肩担赶运入城, 储于北门街江南会馆, 一车方至, 马忽失足, 轮缘之铁与街面之石摩擦生热, 箱适投地, 引起火气, 遂成爆发, 一时车车相连, 人人并肩。风驰电迈, 直达会馆, 藏处遂成巨灾。”^[4]

由此可知, 火药爆发的当天下午, 应该是烈日当头, 正值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恰好移运火药的马车失足, 造成轮子和地面产生摩擦生出热气, 再加上装火药的箱子跌落, 火药又是易燃品, 于是瞬间爆炸, 周围也全是移运的火药, 因此, 形成了巨灾。

作者简介: 樊雨晨(1998-),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

究其发生的原因，要从1927年5月23日唐继尧去世说起，唐继尧去世后，名义上是四镇守使联合统治，实际掌握在实力较强的胡若愚、龙云手中。此后发生了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派人囚禁龙云，在蒋介石的干涉下派胡瑛指挥龙云等人反击胡若愚部，胡部遭遇打击，后被迫与龙云签订“板桥协议”，龙云接任云南省主席，胡若愚暂时退走，龙云成了云南的头号人物。胡若愚转向川、黔军求助，在两方的支援下，胡、张与龙云之间的混战，在事实上成了川、滇、黔三省军阀在云南境内的混战。蒋桂战争爆发，龙云向贵州进军，意在支援蒋讨桂以及报复黔军“援滇之仇”，在贵州交战之际，胡若愚、张汝骥又向昆明发起攻击，驻守省城的胡瑛一方面忙于布置城防，一方面急电龙云回昆解围。于是在1929年的夏天，胡、张、孟联军攻击昆明时，昆明城危，龙云担心胡、张利用昆明城北门外商山寺所藏大批火药、炸药攻城，下令军械局将大批火药移入昆明城内北门街江南会馆内储存。就在运输过程中不慎发生了此次巨大的火药爆炸灾难。万揆一先生所著《昆明掌故》增加了一些细节的地方，如“滇第五军军长兼省府主席龙云与滇第二军军长、省府主席委员胡若愚和滇第十军军长省府委员张汝骥形成三军对垒局面后，胡、张二人引来川军、黔军，连攻陆良、师宗、宣威等县，扬言即将进袭昆明，此时昆明城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正值龙云在贵州不断获胜时，胡、张、孟三人联军袭击昆明，时代理主席胡瑛急电龙云回援，危机才得以暂时解除。”^[5]至于火药的来源，据资料显示，此处北门城外商山寺（今莲花池附近）的火药早在清末时期就堆放于此，成为了火药库房。

1929年7月9日，警察三署的巡官、警长先后向署长岳树藩报告，军械局的官兵押解民夫、牛车、马车，运送军火到江南会馆，火药遍街泼洒，到处都是。作为地区治安机关的负责人，岳树藩明白沿街抛洒危险爆炸物品的严重性，于是采取了防范措施。他派出一群警士和夫役沿街洒水清扫，并向市政府公安局及时做出报告，雇佣一些妇女、儿童参加沿路清除工作，虽有防范措施，但由于火药数量庞大，运输过程中的火药损耗，最终边清边运，边运边洒，直到7月11日午时，还是不慎引发爆炸。事后云南陆军军械局局长龙雨苍在向云南省政府汇报自称，搬运火药一事，事前并未参与商议也没有接受任何上级指令完成此事，而是由军务处（军械局下属部门）直接派人到北门外商山寺搬运火药并导致失慎爆炸，表示对搬运火药一事严厉拒绝并向上层汇报此事，并于7月29日向灾民执委会陈述事实。

根据以上档案、地方志、史书、报纸媒体等史料记载，我们可知，此次“七·一一火药爆炸事件”是人为造成的、与政治因素相关联的惨案，我们能确定的是此次灾难的发生系民国军阀之间混战的结果，在没有考虑民众生命安全、城市规划建设的情况下，贸然搬运危险物品到人群聚集区域，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在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传达和沟通上没有协调一致，是政府运作机制的缺失；在对于当下局势没有正确的认知就贸然采取行动，是决策者的巨大失误。

三、灾难发生时的情形

爆炸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张希鲁即到现场调查采访，并依据采访材料撰写了《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一文，投诸报社。该文详尽地描述了火药爆炸后当时的景象，可谓是极其惨烈。文中可初步了解到当时灾难发生的一些情况，首先可知此次火药爆炸的威力非常大，几乎整个江南会馆及周围地区都受到巨大的影响，可谓是天塌地陷，附近的县都能听到爆炸的声音，甚至二十里外的九门里“空中忽落人腿”，整体的受灾情况相当严重；其次此次灾害发生的太过于突然，也是造成伤亡惨重的原因之一，由前文可知，火药的搬运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决策者和搬运者的疏忽，仍然使部分火药散落在地，最终不慎引发此次爆炸，当地的居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经历了此次灾害；最后北门街附近人口密集，加之还有畏惧城外战乱迁居进城的居民不在少数，使得受灾人数伤亡过多，且不用说周围的建筑众多，损毁严重。

灾害发生后市长李修家派驻各处的便衣警察纷纷去调查，所知的灾情均体现在市长报告中。该报告侧重于记录灾害发生后爆发地的状况、受灾的主要区域、主要灾区的受伤人数和房屋损毁程度以及昆明市其他地区受此次灾害影响的表现。

张希鲁先生的这篇报道非常及时的记录了灾害刚发生时的情形，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对于我们了解灾情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可以说是最为直接的现场记录，作者出于人道主义，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此次惨祸。灾民无疑是此次爆炸案中最无辜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损失如何得到弥补，精神的

创伤如何治愈？社会的应对及善后问题也会变得相当繁琐、复杂，政府官方组织采取的措施是否行之有效；中央对地方出现困境时的“关怀”是否到位；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对灾害的救助力度是否足够以及灾难之后人民的生活是否恢复如常等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找寻答案。

四、具体灾情分析

结合《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提供的受灾区域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灾情统计数据 and 《昆明市志》中《民国时期昆明市行政区划建置表》三部分内容，对于此次爆炸的主要受灾区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内容包括该街道及附属巷户数、男丁和女口的总数、在此次灾害中分别受重伤、轻伤或是死亡的男女人口数量以及受损房屋的数量，其中房屋的毁坏数量又可分为“全房、半房、微房”三个层次都一一记录在册。事发地附近江南会馆、北门街下（《昆明市志》中为北门下街）、北门上街、北仓坡、世恩坊、双眼井一带居住人口最多，受灾情况也最为惨重，其中人口构成男女比例较为接近，多以家庭组织结构为主。该区域的房屋几乎是全部损毁，除大部分全部损毁外，其余的也都是一个程度以上的损毁，几乎没有能够完整保存的房屋，可见其爆炸的威力之巨。

毗邻这一带区域的左哨巷、龙门桥、贡院街（东陆大学附近）、贡院坡以及附属四个巷子：裴家巷、蔡家巷、四方井巷、堆子巷居住人口仅次事发地附近，重伤、轻伤人口人数虽也不少，但死亡人数相较于事发地附近有明显减少，加之正值七月学生放假之际，所幸学生伤亡人数不多。

据东陆大学校方请求赈灾会拨款的函件中可知“查七·一一火药爆震，敝校弥迹灾区并遭波及，损坏屋顶、窗棂、门户、墙壁、用具以及物理测量仪器、化学药品等项，为数颇巨”，学校在此次爆炸中的损失以校舍、教学楼被炸毁和教学用具仪器被破坏为主。螺峰街、大小梅园巷、高帝巷（高地巷）、大兴街等区域的情况于左哨巷一带相近，相较于事发地周围，灾情稍好，但整体还是位于受灾范围之内，房屋的损毁程度约是全部损毁的较少，但近半损毁的较多，轻微损毁的也不在少数。

圆通下街附缘忠巷、圆通上街附初地巷、圆通西巷、小东门正街等区域一则距离事发地较远，二则居住人口较少，因此灾情较之前区域不算严重，无论是人口的损伤还是房屋的损毁，情况都稍好，另因该地区除居民居住外，还包含一些公共场所，如军队驻扎的太阳宫和忠烈祠，女子感化院和男子感化院，前者隶属于军队管辖，后者则为昆明市政府警务机构的下属会办机关。太阳宫和忠烈祠人员受伤以轻伤为主，重伤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和男子感化院均无人员伤亡，仅有部分房屋受损。翻阅 1928 年的期刊《昆明市声》，有一篇名为《参观昆明市男子感化院记》中记载道：“该院于前清季年成立，旧名游民习艺所，唯时款项支绌，仅每日由巡丁带往各处疏通沟道并应各处雇佣”^[6]人员应在四五百人左右，因此推测此次爆炸中感化院内并无人员伤亡可能与感化院规定有关，院内人员可能被巡丁带往各处干活暂未归来，因此避免了此次灾祸的发生。

张希鲁《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中提到除附近的居民是受灾主体外，押运火药入城的士兵、民夫和牛马车夫也是主要的受灾人群，并且由于这些人是最直接接触火药爆炸的人，基本无人生还。

受灾情况总计^[7]

表纲	灾区外合计	灾区内合计	总计
户数	37	3013	3050
男丁	54	6192	6246
女口	81	6982	7063
重伤人口男	1	310	311
女	2	474	476
计	3	784	787
轻伤人口男	2	808	810
女	7	1033	1040
计	9	1841	1850
死亡人口男		196	196
女	1	188	189
计	1	384	385

全房院数	1	104	105
毁屋间数	43	2475	2518
半房院数	1	132	133
毁屋间数	45	2540	2585
微房院数		65	65
毁房间数	14	896	910

资料来源：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云南省政府关于昆明市长所呈本市“七·一一”灾情调查各表已送赈灾会查照的指令》，档案号：1106-001-02120-025。

根据云南省档案馆此次“七·一一火药爆炸案”灾情统计可知，该数据表是灾区外和灾区内数据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是由灾区调查组调查后形成的数据为基础，并以灾民的自行投报登记相互核对形成，据上报的函件中称所有的受灾户口已经完全汇入到这个统计表中，截止日期应为当年的七月二十六日，之后如若还有需要更正校正的再继续统计。据总表可知，该区域的居住人口约在一万三千人左右，根据《1911-1948年昆明市人口统计》1929年昆明市区人口约有12-13万人，此区域人口约占昆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算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据统计表可知此次灾祸中受重伤人数有787人，轻伤人数有1850人，死亡人数有385人，全域记录在册的受灾人数高达3022人。

以上是官方给出的具体数据，此外一些史料对于受灾情况也有记录，如《昆明市志》中记载“在11日搬运途中不慎发生爆炸，波及五华里，受灾3200余户，12200余人，炸死329人（未包括过路者及尸体残毁无人认领者），重伤致残579人，炸毁房屋2927间。”^[8]政协文史资料中有“据统计此次受灾者远近共达1200余户，罹难灾民约12000余人。数日之后，痛苦哀嚎之声犹时有耳闻。”^[9]《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中记载道：“附部三四里住宅墙垣，崩塌者无数。东北城垣约三四里廛屋千余家，立成瓦砾，焚压震裂死者千余人，伤者近万人。”^[10]袁嘉谷为惨案所撰写的《北门街火药爆炸案碑记》中则称：计肢体纷飞者30余人，压毙震毙者480人，焦头烂额、负重伤者1790余人，负伤较轻、呻吟不绝者2340余人，无家可居、无米可炊者13570余人。”^[11]昆明市志、文史资料与征信录中的受灾人数相近，袁嘉谷先生撰写的碑记与官方统计数据接近，但增加了没有受伤过重但在灾难中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仍有万数。官方统计的数据并未将其列入受灾人群之中，但官方具体的数据给我们一些参考，如不同街巷的具体受灾情况大致如何，精确的数据对于善后工作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有待接下来的考察。受灾的总体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庞大的数字昭示着此次灾祸的严重性。

五、结语

此次北门街火药爆炸灾祸与以往发生的灾祸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场人为的，本可避免发生的灾祸。由于这一时期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各势力处于一个混战的阶段，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在为了争夺利益而博弈，此过程中忽视了民众的生命安全，强行调动火药堆放的位置，贸然将其搬运入城，必然会导致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于是在居民区火药的爆炸导致数量众多的居民和建筑被摧毁，无数生命丧生于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惨祸之中。这次灾祸是一次具体的、巨大的由于军阀斗争而导致人民受到极度摧毁的事件，放眼整个中国都是鲜有发生的，因此，值得我们反思。在战争年代，政治因素、军事活动对于民众所带来的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民众的生存权、财产权受其影响的力度是不可忽视的。战争不能够成为损害民众权益的借口，民众的权益也不应为战争而牺牲。通过梳理此次灾情，也为现代灾害预防管理起到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云南信息报编.旧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 [2]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等函请募捐案的代电[Z].1929年7月22日.1106-004-02993-017.
- [3] 陆复初.昆明市志长编(卷10)古代之五[M].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4.
- [4] 张希鲁.记昆明移运火药之灾[M].出版社不详.云南省图书馆藏.1929.

- [5] 万揆一.昆明掌故[M].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 [6] 作者不详.参观昆明市男子感化院记[J].昆明市声.1928(17).
- [7]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政府关于昆明市长所呈本市七·一一灾情调查各表已送赈灾会查照的指令[Z].1929年8月7日.1106-001-02120-025.
- [8]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昆明市志 (第七分册) [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 [9]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学习委员会编.风雨忆当年: 昆明市政协文史资料集粹 (上) 军政篇[M].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
- [10] 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编.昆明市七·一一赈灾会征信录 上册[M].云南省图书馆藏.1930.
- [11] 袁嘉谷著; 袁丕厚编.袁嘉谷文集 (第3卷) [M].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Analysis of the Disaster Caused by the Gunpowder Explosion on Beimen Street in Kunming in 1929

FanYuchen¹

¹*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11, 1929, an explosion of gunpowder occurred in the area of Beimen Street on the outskirts of Kunming City. Hundreds of residents died and over ten thousand were injured in the blast. This was a huge disaste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Kunming. This incident took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local warlord Long Yun's forces and those of Hu Ruoyu and Zhang Rují. It was a man-made tragedy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factor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or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dangerous goods were transported rashly to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showing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disaster, the special cause and wide-ranging implications, this explosion case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disasters and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Keywords:Social History of Disasters; Gunpowder explosion; Disaster situation analysis ; Applica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